2021.10.29

市民日報

仁慈堂博物館 傳承澳門中西文化交融

「每個城市都應該有其歷史、集體回憶和文化認同，缺乏其中一樣，就如剩下一副軀殼。」 仁慈堂值理會主席 飛安達

仁慈堂見證天主教來華前世今生

談及澳門的地標，議事亭前地無疑是公認之一。自古以來，該區集行政和公共機構於一身，到今天依然舉燈璀璨，其中自澳門開埠不久便佔有一席地的仁慈堂，見證著澳門的前世今生。

1568年，葡萄牙耶穌會士賈尼勞主教（D.Belchior Carneiro）抵達澳門，次年便創立仁慈堂。至於創立原因為何？他書信中就曾寫道：「當我來到這個以『上帝之名』命名的港口時，當地還沒有太多葡萄牙人的房屋。我來到這裏不久就成立1家醫院，既對天主教徒也對異教徒開放。我還成立了仁慈堂弟兄會（仁慈堂前身），為所有窮苦人家和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救濟。」仁慈堂在過去除建立醫院、孤兒院、麻瘋病院等，也曾參與澳門社會和政治事務。

歷史上，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由明朝開始，先後透過澳門打開中國的大門，輸入天文知識、數學知識、宗教，促使澳門在十六至十八世紀成為中西文化交匯的重要橋樑，也反映出耶穌會在澳門乃至中國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作為後人，我們值得重述耶穌會過去的故事。」飛安達為傳承和發揚耶穌會的歷史，決定由仁慈堂自資在原來的辦公地方，改建成博物館向大眾開放，於2001年12月和2011年12月先後建成展區，並分別由時任政長官何厚鏵和崔世安揭幕。10年相隔，均由本澳最高領導人主持儀式，也曾接待多位葡國總統等名人，足見仁慈堂地位，承載著歷史的特殊意義。

鎮館之寶手抄章程跨時空300年

仁慈堂博物館隱身大樓右側，沿著石仔路穿過花園巷弄，甫入門便見賈尼勞主教的雕像。踏著鋪上地毯的木樓梯拾級而上，置身極具歐陸古典建築風格的裝潢，讓人一下子有身處歐洲的錯覺。

會議廳作為展區之一，氣氛莊嚴祥和，其中安置了創始人賈尼路主教的頭顱遺骨、全身畫像以及當年陪葬的十字架。另外，牆上也懸掛了部分仁慈堂榮譽贊助人的肖像，包括何賢、李際唐、高可寧、傅德蔭、梁昌、鍾子光、白馬行醫院院長索雷斯醫生、多位前澳門總督及前任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和崔世安等，透過這些照片，重溯他們的蜉蝣歲月。

博物館內藏品多不勝數，但要數「鎮館之寶」，一定是1662年的《澳門仁慈堂章程》手抄原件，該章程超越3個世紀，是該堂最早、保存最久的歷史文獻，內裏甚至連首頁的宗教人物圖案亦是手繪。章程中，提及「對天主教徒而言，沒有甚麼比奉獻這一神聖機構，援助窮苦人家，更值得讚揚、更高尚。」可見仁慈堂為窮困者提供無私幫助的初衷。

救濟窮困者，單靠建立組織並不足夠，賈尼路主教於是興建「貧民醫院」，後來演變成「聖辣菲醫院」（即白馬行醫院），是澳門歷史上最古老的西式醫院，「前白馬行醫院鈴鐘」便在當時一直懸掛於上。

MADE IN CHINA耶穌會瓷器傳教載體

博物館是世上為數不多以耶穌會作專題的1家，包括約300件與耶穌會有關的展品。橫跨十七至二十世紀，由中國、日本、歐洲製作。當中絕大部分展品，皆是飛安達數十年間從各地搜羅所得。他憶述，約30歲時便迷上中國瓷器，生於天主教家族的他，更是對中國出產的西方宗教瓷器十分好奇：「為何在當時的瓷器上會出現耶穌會圖案？」

「耶穌會瓷」，即在中國瓷器繪上西方宗教色彩的畫像，造就中西合璧的特殊風格，葡萄牙人就曾利用澳門作為瓷器中轉站，因此現時耶穌會瓷在歐洲市場上，也被稱作Portuguese Colonial ware，即「葡國殖民地瓷」。明朝末年，利瑪竇、湯若望促使天主教在中國傳播，十七世紀，中國瓷器開始出現聖經故事、十字架等元素的裝飾，及後更激盪出更多風格迥異的瓷器，成為傳教的重要載體，中西文化交融的「見證者」。

館內藏品琳瑯滿目，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系列清代景德鎮窑青花瓷，及各類粉彩耶穌會聖水罐。耶穌會瓷多以耶穌會徽IHS（JHS）作主題紋飾，單單1個徽章，繪製的樣式就包羅萬有，今天看來仍創意十足。

仁慈堂值理會主席飛安達

聖水罐中有以楷書書寫的「聖水十二效」，出自晚明備士天主教徒李九功《勵修一鑑》，闡述了聖水的12個功效：「教中有聖水，其效約有十二，雖不專為卻疾而用，問有虔誠用之，即疾亦賴以痊者。」又有摘自《聖神九日敬禮》構文的「聖神降臨 從天射光」。若果參觀者仔細端詳，可發現其中1個罐的JHS出現了左右顛倒的誤筆，估計是工匠不諳洋文，繪製時失誤所致。

一眾耶穌會青花瓷器，飛安達最後購入的藏品「青花耶穌受洗碟」同樣闕目。碟內施洗約翰舉起右手，為雙手合十的耶穌施洗，背後的鴿子從天而降。展現神聖一刻。碟邊寫上的「Mat：3.16」，便是《馬太福音》第3章第16節的場景：「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仿佛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耶穌瓷除運用景德鎮青花技法，也利用盛行於清廑、乾時代的墨彩描金，展館內的雙耳瓶、六角宮燈、十字架聖水器等，素淨淡雅搭配上耶穌會徽圖騰，有時也會融合「巴洛克」風格，在瓷器上加入金銀銅材質點綴，更顯精緻。

事實上，當時不少傳教士一邊傳教，一邊收集景德鎮的製瓷技藝。清康熙年間來到中國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Père d' Entrecolles），便曾經在書信中提及：「關於製瓷方法，除了親眼看到的以外，我還從基督教徒耶裏了解到許多特殊情節。在這些基督教徒中有不少是從事製瓷工作的人，也有一些是大瓷商。」

憑空想像創作出混血兒神明形象

中國瓷器大放異彩，日本陶瓷藝術也深受影響，更曾一度在禁教時代成為傳教的「間諜」。日本著名考古學者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指出：「陶瓷是跨越中世紀東西方世界的一條友誼紐帶，同時也是一座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十六至十八世紀，這種具有遠東獨特藝術、「素肌玉骨，沉靜典雅」的CHINA，在洋人間風靡一時，貴族間更是人手一件的身分象徵。據悉，當時的外銷瓷，一是根據買方需求而製，其次是加入西方構圖風格和圖案而成，主銷國內市場，其中聞名中外的景德鎮更成為天主教瓷器製作的中心。

儘管明朝時期天主教與中國開始頻繁往來，但這種洋人的外來物並非人人了解，尤其「聖人長甚麼樣子？」均無實際資料比對，一時間中國工匠面面相覷，唯有按照中國人的模樣成品，在他們筆下成為當代「混血兒」。

故此，產自中國的聖母像和耶穌像，仔細看均可發現面容略帶東方特色，眼睛較為單鳳細長，館內超過1米高的展品《粉彩耶穌聖心像瓷器》，清晰可見耶穌的手指纖細，姿態溫婉，頗有觀音意味。另一樽乾隆青花細頸瓶《耶穌受難圖》，更見耶穌頂著大肚腩、頭髮稀疏、胸口帶有體毛，兩旁的人物騰雲駕霧。是為地道的佛教、道教神明形象。兩者結合，十分趣怪。

與本地文化結合，其實不單是中國獨家技藝，由非洲出品的象牙《聖母抱耶穌像》，以及印度象牙《聖母升天像》，人物髮型、五官，都融入當地人的外貌特徵，今天看來意識大膽、創新且玩味十足。惟無可置疑的是，無論神明的樣子如何，他們都是帶著生命的曙光，祝福世人。

博物館弘正向思維講好澳門故事

館內除青花瓷和象牙，也包含景泰藍瓷、粉彩瓷、白瓷、玻璃、貝殼等元素，濃縮了十七至十九世紀中西交融的精神面貌。直到雍正、乾隆年間後，曾多次對天主教頒布禁令，這些瓷器因而被停止生產，繪有天主教圖案的瓷器也被大量摧毀。時至今日，這些跨宗教在中國大放異彩的珍品格外稀少，因此彌足珍貴。

飛安達認為，博物館雖然以宗教為主題，但意義在於宣揚正能量，無分彼此，「仁慈堂可以說和天主教息息相關，但任何傳統宗教，都是向好的方面傳導。透過博物館的展品，講好澳門故事，讓人們對仁慈堂歷史和宗教有更深認識。」直到現在，飛安達仍然對館藏珍品十分熱愛，每當在外地看到「心頭好」，即便自己已經收納滿滿，也會向仁慈堂建議購買，讓它們在博物館安靜地訴說縱橫澳門中西交融歷史和文化。

《市民日報》專題組

飛安達介紹《粉彩耶穌聖心像瓷器》。

不同地方出產的聖母像，形象也有當地人的特徵。

一五六八年，葡萄牙耶穌會士賈尼勞主教抵達澳門，次年創立仁慈堂。

1662年的《澳門仁慈堂章程》手抄原件，是該堂最早、保存最久的歷史文獻。

「青花耶穌受洗碟」描述《馬太福音》第3章第16節的場景。

乾隆青花細頸瓶「耶穌受難圖」的耶穌頂著大肚腩、頭髮稀疏。

仁慈堂主席飛安達（右）、秘書長盧茜儀。

3鑰夾萬孫中山畫像辦公室富歷史足跡

採訪當天，獲得主席飛安達及秘書長盧茜儀接待，帶領記者一睹他的辦公室和會客廳。隨著辦公室大門打開，歐陸風格配以中式陳設的優雅別致，午後一縷陽光剛好從窗戶投射，教人驚艷。抬頭一看，牆上懸掛出自民國時期的孫中山和宋慶齡畫像，裱在手工雕刻製成的楠木框內，為一處歐洲「面孔」沾上些許中國「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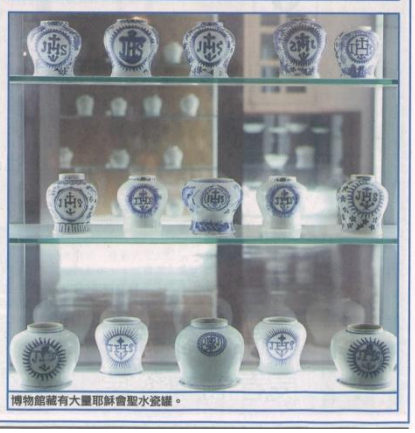
房內藏有1個深灰色大夾萬，據說是舊時的配設，並需要3把鑰匙才能打開。細看下，其中1個鑰匙孔有被人鑿過的痕跡，他們笑言「這是個歷史見證，所以我們也沒有把這個孔封上。」至於內裏藏了甚麼？飛安達諱莫如深打趣說「有啲嘢！」

至於另1個房間，又見懸掛了孫中山畫像，附有其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說起來，仁慈堂與孫中山有深厚淵源，並延續至今。孫中山曾租用仁慈堂物業開設醫館，但地點一直存疑，直到近年仁慈堂值理會整理檔案時發現，上面清晰記載了該位置是議事亭前地14號A（即現今郵政局側花園），以年租144元租給孫中山，孫中山以英文名「Sun Yat Sen」簽名作實，對孫中山在澳門的活動有著重要的佐證和意義。

除了文物，辦公桌子上也擺放了飛安達獲得特任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頒發仁愛勳章，及葡萄牙總統德索薩頒授爵士勳章的照片，記錄著飛安達不同的人生故事和足跡。

記者有幸一睹博物館辦公室和會客廳。

仁慈堂見證著澳門的前世今生。



博物館藏有大量耶穌會聖水瓷罐。